

杭州市散工生存状况调查*

刘志军

内容提要：对杭州市散工的总体生存状况做了抽样调查。着重描述了散工的人口学特征、工作情况、生活状态、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关系、将来计划、内心感受与意见呼声等方面的内容。认为散工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产物，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和形成中的边界，“散工”现象理应成为政府与社会的新的关注点，关注他们社会处境的边缘化以及社会保障的缺失，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为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散工 非正规就业 农民工

作者刘志军，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德国基尔大学访问学者。（杭州 310028）

一、前言

所谓“散工”，是指外来劳动人口中从事各种“自由”职业的人，他们既没有个体营业证件，也不属于各类企业中的合法受雇者，从事的行业各种各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稳定雇主的他雇者，如搬运工、三轮车夫、保姆、承包工地上的建筑工等；一类是自雇者，如流动性的修车者、修鞋者、卖水果者、卖烤红薯者、卖小商品者、卖夜宵食物者等，另有拾荒者、废旧回收者等等^①。事实上，这些散工在法律保障上一直处于受忽略的位置，他们所能获得的社会保障更是少之又少。

早在 90 年代初期，周大鸣等学者等开始关注珠江三角洲的散工等外来工群体，进行了多次研究，并在此后做了追踪调查。此外，甘满堂、李培林等大陆学者也对城市街头外来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现象和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海外对散工的关注以黄洪、李剑明等对香港边缘劳工的研究为代表。国外也有以“边缘劳工”或“散工”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发表，前者如 Bruce S. Harvey & Rudolph L. Kagerer 对美国乔治亚州的家禽饲养工人的研究，后者如 Noel Gaston & David Timcke 对澳大利亚青年散工的研究，等等。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发展的滞缓、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外来劳动力开始涌入经济发达地区，使城市就业压力骤然加大，许多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散工由此成为众多失业人口、流动人口的巨大生存空间，散工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散工群体，认识其性质特征、生存模式，制定公平合理的政策措施予以保障支持，关注他们的生存和救助，已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立足于当前中国大陆经济最具活力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杭州市的散工为研究对象，着重对散工的人口学特征、工作情况、生活状态、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关系、将来计划、内心感受与意见呼声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调查，以期为政府制订相关政策措施提供参考，并为大陆散工的整体性研究和比较研究提供实证支持。

二、调查设计与结果分析

基于散工的零散特性，调查使用偶遇抽样与“滚雪球”的方法选取访问对象，以散工的就业市场和居住社区为调查单位，采取半结构式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参与观察相结合的方法，详细了解散工的人口构成、就业方式、社会交往、生活评价、社会支持网络、未来计划、内心思想等内容。调查主要在 2005 年春节之前及暑假期间展开，涉及地域包括：杭州中西部的文一路、

* 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课题编号：N04SH01）。课题研究得到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及周建新博士的指导和帮助，谨致谢意！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01、02、03 级的部分本科生参与了课题的问卷调查与访谈工作，一并致谢！

文二路、文三路一带及留下镇区，杭州北部的三墩、汽车北站、舟山东路一带，杭州东部的火车东站、汽车东站、三里亭一带，杭州东南部的四季青服装市场周边地带，以及杭州市中心的武林门、延安路、庆春路、中山北路一带。问卷均采用一问一答的面对面询问方式填写，共计回收 337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310 份。研究者并在问卷调查过程中，根据对方情况和意愿，有选择地对 48 名受访者做了个案访谈。在后期资料整理过程中，作者运用 SPSS 软件对可量化项目进行了计量统计。

为简便起见，下文即按照调查问卷的分类方法，分别从人口学特征、工作情况、生活状况、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关系及将来计划六个方面，对本次调查的结果做一概要的介绍与论述。

（一）人口学特征

根据调查样本，散工当中以男性居多，约占六成。散工的总体文化程度仍偏低，只读过小学的约有 1/4，根本没有入过学的约 1/6，而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 13.5%。

散工的年龄基本上呈一种统计学上的正态分布，即集中在 20-29、30-39 与 40-49 三个年龄段，分别占 25.2%、38.1%、18.7%。由于散工劳动往往比较繁重，工作时间很长，对于人的体力和精力的要求都较高，这是青壮年占多数的一个重要原因。已婚散工约占七成，如果根据年龄段进行细分，则发现其结婚年龄呈现推迟的趋势，有 59.0% 的介于 20-29 这一年龄段的散工未婚，并有 8.5% 的三十出头的人尚处于单身阶段。这种趋势一方面反映了婚姻观念的变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以外出务工者居多的年轻一代在婚姻上遇到的两难处境：要结婚就要外出打工赚钱，修新房、置家电、备聘金，而背井离乡从事长时间的忙忙碌碌的工作又使得找对象、谈恋爱的闲暇成为难以企及的奢侈品。

从身份来看，散工群体中除了占多数（61.3%）的农民工以外，尚有为数不少的城镇下岗工人和没有享受到下岗待遇的乡镇企业工人，两者约占 11.6%。另有 12.3% 的散工为离校学生，他们大多可并入农民工之列。其它尚有手工业者、商人、退伍军人等，他们当中也多数出身于农民。因此，农民正是散工的主要来源。从地域来看，浙江本省和临近的安徽、江西是输入散工最多的三个省份之一，分别占调查样本的 21.9%、21.9%、12.9%，这是地缘因素及地区间的经济落差所决定的。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散工输入省份是河南，占 17.4%。河南人地矛盾十分突出，人们出走的推力相对巨大。他们又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该省东部地区，可见路途较近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这些都与推拉理论和迁移成本理论的解释相契合。

散工中的少数民族很少，占调查样本的 3.9%，主要来自广西、青海、新疆、湖南等地。从宗教信仰来看，大多数散工自称没有信仰（77.4%），回答信仰道教、佛教、菩萨等的约占 14.8%，另有少数人信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占 7.1%。

（二）工作情况

1. 在杭时间与工作满意度

约有 60% 的散工在来杭州打工之前没有去过其它地方，且有半数以上的人在杭州工作了两年以上，他们在杭州的工作相对比较稳定，杭州对他们的引力较强。

虽然辛苦，散工们对于所从事工作的满意度并不如人们预想的那样低，约有三分之二的被访者表示对工作满意、比较满意或感觉一般，评价为不满意的只有 27.4%，而表示很不满意的则更少，只有 1.9%。这一结果与我们的“客位”评价标准及散工们的“主位”标准之间的差异息息相关。散工大多出自农村或较为贫困的家庭，他们在杭州的收入虽然相对微薄，但纵向比较仍觉得有很大的改观，因而往往产生一种相对满足感。但身处城市的他们，也免不了要与周围人群进行比较，并往往产生一种边缘感与贫困感，从而衍生部分的不满。

2. 来杭途径与动机

56.8%的散工通过亲友或老乡的介绍来杭务工，另有 39.4%“自己闯来的”散工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先期来杭打工者的影响和带动。

至于散工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杭州做散工的原初动力则要显得繁杂些，但统计仍表明，最主要的驱动力还是来自挣钱难觅、机会多寡、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等方面的比较，因此，“这里赚钱多”、“老家缺乏发展机会”、“老家生活条件差”、“以前的工作干不下去”等是多数散工的最主要原动力，且对于男女两性来说，这种状况也基本一致。这种结果契合“推拉理论”对于社会人口流动的解释框架。

3. 工作时间与收入

散工们每天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在 8 小时以内的只有 21.3%，在 8-12 小时之间的约占一半，达 45.5%，另有约四分之一（25.5%）的散工每天要劳动 12-15 个小时，更有约 7.7%的散工的平均工作时间超过 15 个小时。散工们长时间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趁年轻能干时获取最大效益，另一个原因是缺乏打发闲暇时光的娱乐方式，正如一个被访者所说的：“反正闲着也难过，不如多干一下，多多少少还能挣点钱”。

散工们虽然辛苦、工作时间长，但一年下来的劳动所得却往往不多，甚至少得可怜。报道说年纯收入在 6000 元以下的散工占 44.2%，其中又有 26.4%在 4000 元以下、8.7%的更不足 2000 元。不过，与呆在农村相比或与以前的工作相比，散工们普遍对此有乐观的看法，认为比自己干别的赚得多就好，而并不奢望与“城里人”那样每年有几万元甚至更多的收入，这多少反映了他们面对现实不公平的无奈以及直面现实的务实精神。一位女性散工就坦言道：“这世上没有绝对公平。我姐在广州月薪 10000，人比人要吓死人，但自己活得开心、活得自在才最好。”或许“活得开心、活得自在”，心安理得地凭自己劳动的双手为家庭撑起一片天，就是散工们朴素的人生哲学。

（三）生活状况

1. 闲暇生活

与打工群体一样，散工的空闲生活十分单调，由于工作时间很长，有的甚至谈不上有什么闲暇生活。自认为空闲生活丰富或比较丰富的只有 12.3%，43.2%的认为空闲生活单调或十分单调无聊，另有 44.2%的散工评价为“一般”。散工闲暇生活的方式十分有限，主要是看电视、聊天、睡懒觉、看报纸、逛街等，其中以看电视为最主要的方式。

2. 日常开支

散工的支出一般是省了又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月支出（含房租、水电、伙食、日用品等花费）不足 500 元的达 52.3%。大多数散工的月房租在 150-200 元左右，月伙食费在 200 元左右，其它开支也停留在很低水平，约 100 元左右，包括手机费、日常用品费等。月开支高于 500 元的散工主要是在吃和用的方面略高于其它散工。58.5%的女性散工几乎没有买过美容护肤品，年服装消费不足 50 元的达 41.5%，低于 200 元的共占 66.2%，而从来没有或很少做过美容美发的占 87.7%。

散工的省吃俭用也可以从他们生病的处理方式中得到反映。据统计，有近一半（48.7%）的散工在患病之后会“自己买药吃”（其中还包括一些从老家买药带到杭州的散工），更有 11.3%的人连药都舍不得买，会“自己熬过去”，另有一些人则会求助于打工者中懂得医药知识的老乡，这种现象在河南人群中较为普遍。如果遇到大病，实在没有其它办法可想的时候，他们才会到诊所或正规医院就医，并有不少人会选择回家治疗。因此，生病成为散工最为惧怕的风险，生大病更往往成为导致散工贫困和负债的直接根源。

由于受到种种政策性的限制，能将学龄期的孩子带来杭州入学的散工少之又少，只有 2.6%左右，另有 3.9%的人退而求其次，将孩子送入杭州的外来工子女学校就读，更多的人（93.5%）则是他们的父母带着孙子辈在老家的学校念书，成为“留守孩”。

无论在何处念书，孩子念书的花费都是这些散工外出打工挣钱的最主要推力之一，其劳动所得的大部分也都花在这一方面。有些散工尽管时下的子女学费支出不大，但预期的学费支出也成为他们不小的压力。

3. 生活起居

散工通常住在城市的周边或城区工棚中等边缘地带，这些住处多为廉价的城郊出租屋或者由雇主提供的简易住处，设施不全，环境较差、治安也难有保障。调查显示，有 61.6% 的散工为一家同住或单独居住，由于有 51.3% 的散工是夫妻或全家同在杭州的，这表明独自出外的散工中只有 10.3% 的选择独自租房，其余都选择合租而降低生活成本。

或许得益于杭州的整体环境，散工们对于自身居住环境的总体评价并不低，认为“较脏”或“很脏”的只有 12.6%。散工们对于居住地治安状况的评价也高于同类调查所得，认为“较差”或“很差”的只有 15.8%。评价治安差的散工所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小偷问题，而在人身方面还是有着相当高的安全感，这与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散工的感受有较大差异。

（四）劳动与社会保障

1. 工资与就业

调查表明，偶尔会遭遇工资拖欠、克扣问题的散工约占他雇者的 21.4%，另有 8.9% 的表示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这说明工资的拖欠与克扣仍是值得社会关注的令他雇散工头疼的问题。

除此之外，失业问题也是他雇散工最为担忧的问题之一，正是由于工作的零散性质，这些他雇散工往往难有工作稳定的保障，短期失业也就难以避免。抽样统计表明，他们的年平均失业期在 2 个月左右，短则十天半月，长则半年，甚至有经历过一年多没有找到工作的个别散工案例。由于散工工作性质的零散及工资保障的缺乏，有 49.0% 的散工报道说曾遇到过身无分文的境况，这时就只有求助于身边的老乡或亲友，甚至需要家里提供接济。在收容遣送制度废止以前，他们中也有些人曾因被抓进收容所，被迫为付赎金等费用而到处举债。

2. 困难与应对

为弥补从主位角度构拟问题的缺陷，我们设计了三道多选题，以了解散工最为关注的事项、求助倾向、对政府的看法与期待等。在统计分析时，我们还分性别进行了分类计算，以反映性别群体间的差异。

统计结果表明，男性散工最苦恼的五大事项依次为“挣钱太少”、“怕生病”、“竞争太激烈，工作压力太大”、“子女上学问题”及“生活条件差”，女性散工则分别为“挣钱太少”、“子女上学问题”、“怕生病”、“生活条件差”及“本地人对外来工的歧视”。两者在先后排序及内容上有着一定的差异，但仍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此外，他们也对各种针对外地人的限制、找不到工作、住所不稳定、缺乏亲友、人身安全等方面感到无助和烦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男性散工提出了“为感情所困”的苦恼，其中除了多数未婚男青年苦于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而一筹莫展之外，也有不少单独外出的已婚男子因为夫妇长期分居而产生了情感方面的矛盾或纠缠。

总体来看，散工们最感苦恼的事项中，大多数都与社会保障有关，参照城市居民来讲，就是最低收入保障、医疗保障、失业救济、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内容。然而，散工们不仅不能享受到这样的福利服务，相反，还要忍受适龄子女就学难、社会歧视或漠视、乱收费、情感无依、生活流离等方面的压力和烦恼。此外，在日常生活中，离乡背井的他们还面临着形形色色的困难。那么，在遇到上述种种困难时，他们又会向谁求助呢。

有四成上下的散工回答说基本上只有靠自己解决，如果求助的话，则依次为“老乡”、“亲戚”、“老乡以外的朋友”、“政府”、“雇主”等。可见散工们仍主要地求助于因传统纽带而联结起来的“老乡”和“亲戚”，对于“雇主”和“政府”则基本上

不会抱有帮助自己的“奢望”。与此相对应，有 1/4 的被访者表示不需要（真实的蕴意就是不能指望、不奢望）政府为他们提供帮助。其他人所选择的需要政府提供帮助的事项依次为“平等的工作机会”、“住房、医疗、保险”、“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解决子女上学问题”、“平等的户口政策”、“提供招工信息”等。这些要求与他们最感苦恼的事项正是相一致的。

（五）社会关系

散工群体“形散而神不散”，一般以地缘关系结成松散的非正式团体，团体内部除了乡土纽带外，尚有血缘纽带穿插其间，因而形成一定程度的“抱团”现象。他们往往聚居在一起，从事相同或相关的工作，彼此之间相互照应，在存在竞争的情况下也能共同遵守默认的准则开展良性互动。正因为这样，认为同行之间存在恶性竞争的散工只有 5.2%，而 63.5%的人则表示与同行有着良好的关系。此外，由于一些散工往往约定俗成地划分了各自的生意范围（如早点摊、路边单车修理点、流动报摊、水果摊等），各自为政，因而也有约 28.4%的散工与同行之间很少交往。除了与同行间的关系比较好以外，散工与其它外地打工者的关系也普遍良好，凡与他们有过接触者都没有对其关系做出负面的评价。

虽然散工的社交网络尚带有十分浓厚的乡土性，但由业缘而发展成的“朋友”已在散工们的日常社会互动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男女两性在社交网络方面也有些微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男性通过业缘纽带发展的朋友关系要多于女性，显示出更为外向的社交心态。不过，这些朋友仍局限在与他们有着相似境遇的群体尤其是散工群体之中，而他们与杭州市民的接触主要是工作上的相互来往，以及在所生活社区与房东、邻居间的有限的交往。尽管接触有限，但散工们对于杭州人的总体评价比较正面，除了 31.0%因与本地人很少来往而没有表态外，其他人都对他们与本地人的关系做出了非负面的评价。在对杭州人排外性的评价方面也有着基本相同的结果，认为本地人“十分排外”的没有，只有 7.0%的散工认为“较排外”。

（六）将来计划

1. 职业培训意愿

多数散工对于职业培训的热情较高，表示愿意参加的有 65.2%，另有 17.7%因怀疑培训的质量和现实性而表示“无所谓”，但也有 17.1%的被访者表示“不愿意”，其中有些人因为自己年纪大或知识少、忙于生计无法抽出闲暇、担心受骗而表示“不愿意”。被访者对于技术培训的热情也侧面说明了他们以往获得这方面的学习机会的缺乏，调查就表明，只有 22.9%的此前曾接受过裁缝、修理、驾驶等方面的培训。

这种技术培训的缺乏往往导致散工们只能趁着年轻力壮从事一些苦力性的工作，由于此类工作的低回报，他们不得不以牺牲时间为代价尽力挣钱，而时间的“稀缺”又限制了他们参加技术培训或技艺改进的可行性，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并往往导致“贫困文化”的形成。

2. 田地处理方式与看法

由于散工多为农民，因而在老家多留有田地，这些田地或承包给了别人（占被访者的 21.0%），或抛荒未种（3.5%），但大部分还是由其它家庭成员（配偶或父母、公婆）耕种或自己定期回去耕种，两者各占 45.2%、14.8%。虽然种地收入相对微薄，但仍有 87.8%的被访者表示“愿意保留老家的田地”。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将这些田地视为一种起码能提供口粮的“保障”，持这种看法的被访者占 86.3%。但也有 6.5%的被访者视其为“一种累赘”，因为种的话会蚀本，不种的话也要交公粮等。

3. 理想与憧憬

我们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您赚了钱后最想做点什么”，受访者的回答多种多样，我们对其进行了分类概括，结果表明，散工们赚钱的最主要目的还在于家庭投资，其中主要是针对子女或孙子孙女等后代的智力投资，“供子女上学”几乎是所有有学龄期孩子的散工的优先奋斗目标，一些有一定积累和商业意识的散工则憧憬着在机会成熟时“投资做生意”，其中具有这种想法

的男性散工要多于女性散工。一些年轻的未婚散工则首先考虑赚到一些钱后“娶媳妇或找女友”，一些中青年夫妇则在积累钱财，好“回家修房子”。另外一些人则表示最希望赚到钱后“回家过日子或改善生活”，有这种想法的女性要多于男性。也有人（主要是青年散工）向往现代的市民生活，希望“买房子、买车等”。

对上述结果进行分年龄段统计后表明，由于散工外出的本意基本上是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支持家庭的人生各个阶段的必要开销，包括子女就学、适龄青年婚配、修缮住房等，因此，各个年龄段的散工们基本上都有着共同的关注焦点。而一些散工“希望投资做生意”之类的回答其实指向的也是上述“供孩子读书”、“娶媳妇”、“修房子”等最终目标，因为做生意只是为实现这些理想而积聚钱财的手段而已。

三、总结与讨论

（一）简短的总结

散工群体以男性居多，主要来自浙江各地及临近各省的农村，以青壮年为主，平均结婚年龄呈推迟的态势，总体文化程度偏低。他们来杭的主要途径是亲友或老乡介绍，最主要的驱动力是比较优势，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家庭生计的维持与家庭投资。

散工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但所得往往不多，更乏保障。仍有部分散工遭遇工资拖欠与克扣的现象，失业问题常常困扰他雇散工。他们的消费普遍极低，生活在城市边缘，医疗状况堪忧，闲暇生活单调。九成多散工子女因政策性限制成为“留守孩”，问题突出。散工多在老家留有田地，虽产出微薄，多数人仍视其为一种起码能提供口粮的“社会保障”。

散工群体“形散而神不散”，一般以地缘关系结成松散的非正式团体，其社交网络具有浓厚乡土性，但业缘关系渐趋重要。对杭州的总体评价较好，但对政府整体的不信任感仍十分强烈。散工最感苦恼的事项多与社会保障的缺乏有关。面对各种困难，他们多在亲戚与老乡等初级社会群体内部寻求帮助，对于雇主和政府则鲜抱奢望。散工对于职业培训有较高热情，这侧面说明了他们以往在这方面的学习机会的缺乏，从而导致“贫困文化”的形成。

概而言之，散工是时下一个具有多重贫困性、急需社会支持的弱势群体。

（二）讨论

“散工”作为一个名词，既指称一个特定的社会人群，也表示一个特别的就业类型，这种社会从业者或就业类型在世界各地以及历史上都有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存在，并非为现今中国大陆所专有。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经济改革的深入，城乡移民的日益增加，城镇职工职业流动的日趋频繁，散工作为一种灵活的就业形式，越来越成为吸纳流动劳动力、下岗人员、新就业人员的一个巨大空间。鉴于中国大陆的散工人数众多、影响范围广泛、身份特征模糊而复杂、衍生的问题突出，使得将其作为一个特别的社会亚群体进行研究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依照新的社会分层理论方法，我们可以认为散工正是我国大陆一个形成中的亚阶层，已具有自己比较独特的特点和形成中的边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城市非正规就业形式的拓展，散工的人数在日益增加，并开始具有了日益鲜明的群体特征，例如，散工中的主体部分——来自农村的外出务工者就已开始形成了与农业农民、产业农民工、农民个体工商户等有别的身份认同。要对散工现象进行深入的解读，我们还必须由具体而微的分析层次上升到一个更具宏大视野的高度。简而言之，我们应当将散工群体置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城乡二元化、都市二元化以及世界体系的脉络中来理解。城乡二元化形成了移民的推力和拉力，都市二元化则造成了城市就业机会与劳动力市场的割裂和阶层差异，世界体系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架构则是散工群体日益壮大的全球背景。做为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城乡分割化、都市二元化方面表现得十分典型，散工群体的壮大与影响日深也就在情理之中，加之中国长期的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的历史影响，使得散工问题更为复杂多样。

毋庸置疑，散工是贫困的，无论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是工作酬劳都处于整个城市的底层，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从结构原因来看，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从文化原因来看，“贫困文化”的形成是制约的瓶颈。要帮助散工走出贫困，就需要从社会政策的完善与知识文化的引导两个方面入手，积极探索有效解决散工经济贫困问题的途经。做为城市中日益凸显的一道风景，“散工”现象理应成为政府与社会的新的关注点，关注他们经济收入的低下、精神生活的空虚、社会处境的边缘化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缺失，积极妥善地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为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

注释：

①严格说来，散工成员不限于外来工，因为有些城市居民在下岗、失业、退休或在正式工作以外也有从事散工工作的现象。这里仍依照一般的看法，将散工归为外来工中的一个亚群体进行论述。

参考文献：

1. 甘满堂：《城市外来农民工街头非正规就业现象浅析》，《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8期。
2. 黄洪、李剑明：《香港“边缘劳工”近年的发展：香港“边缘劳工”研究之一》，香港：乐施会2000年版。
3. 黄洪、李剑明：《困局、排斥与出路：香港“边缘劳工”质性研究》，香港：乐施会2001年版。
4.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5. 周大明：《广州“外来散工”的调查与分析》，《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5期。